

清代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活动初探

郭美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北京 100031)

〔内容提要〕明末清初,游牧于西北的卫拉特蒙古共分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四部。由于草场引发部族纷争,其中的土尔扈特部落选择了逐水草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定居。百余年后,土尔扈特蒙古在其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历经归途的战尘,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举部东归。清廷极为关注和重视土尔扈特部众,对历尽艰辛回归故土的土尔扈特部众抚恤接济,指地安置,并安排土尔扈特首领前往避暑山庄朝觐和派人赴藏熬茶。就土尔扈特派人赴藏熬茶一事,清廷在土尔扈特回归后的第一时间即有安排,只是由于以往所发掘史料的不足和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土尔扈特赴藏熬茶之事一直被忽略到现在,以至于形成历史研究的空白。我们知道,土尔扈特蒙古与其他蒙古一样,信奉藏传佛教,在所进行的各种佛事活动中,熬茶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环节和内容。在此所讲熬茶是指信徒在佛教寺院熬茶布施,喇嘛则为之念经祈福。根据目前掌握的档案文献史料,到嘉庆末年为止,东归之后的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参与的有规模、有组织的赴藏熬茶活动共有七次,本文谨对其七次赴藏熬茶活动试作探析。

〔关键词〕民族史 蒙古族 土尔扈特 熬茶 宗教

〔中图分类号〕B9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067(2013) 02-0041-08

清代霍博克赛里即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位于新疆北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后,亲王策伯克多尔济的部众被安置于此,其后人至今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在清代档案文献中,称这部分土尔扈特蒙古为“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或“塔尔巴哈台土尔扈特”。我们知道,土尔扈特蒙古与其他蒙古族一样,信奉藏传佛教,在所进行的各种佛事活动中,熬茶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环节和内容。熬茶作为在藏传佛教寺庙发放布施的一种宗教仪式,在清代通常是由熬茶者向众喇嘛发放金银等物品,众喇嘛则为之诵经祈福。根据目前掌握的档案文献史料,东归之后的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到嘉庆末年为止,所参与的有规模、有组织的赴藏熬茶活动共有七次,其中顺利入藏熬茶的有四次,搁浅或半道折回的有三次,本文谨对其七次赴藏熬茶活动试作探析。

一、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前的赴藏熬茶活动

清代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并非始自东归之后,其最早的赴藏熬茶活动当溯至清入关不久。有

* 〔作者简介〕郭美兰,女(锡伯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学者根据国外史料考证,顺治三年(1646),土尔扈特首领书库尔岱青亲自返回西藏拜见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额尔德尼,被五世达赖喇嘛封为土尔扈特部落的“汗”。顺治十五年(1658)书库尔岱青再次赴藏礼佛,拜见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额尔德尼,以取得藏传佛教对土尔扈特部落的支持。书库尔岱青赴藏熬茶这一历史,据《清高宗实录》载《御制土尔扈特部纪略》记述:“和鄂尔勒克因率其子书库尔岱青等至俄罗斯之额济勒地,其时阿玉奇尚在襁褓,因留巴图鲁浑台吉处,后书库尔岱青往西藏而回,遂向浑台吉索阿玉奇归俄罗斯。巴图鲁浑台吉为阿玉奇之外祖,以时代计之适相当。”这段史料形成的背景是,土尔扈特人众回归之当年,其首领渥巴锡一行前往热河的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九月初八日行至伊锦霍洛口行营遇见正在此处狩猎的乾隆帝,此后一路随围观猎,直至避暑山庄。在渥巴锡一行前去觐见乾隆帝的途中,清廷所派护送大臣详细询问其部落史、家族史,发现以前对土尔扈特部落的了解不仅不全面,甚至有错误,因此在《御制土尔扈特部纪略》记述其世系之详。也就是说,《御制土尔扈特部纪略》之记述还是有其可信之处,因为这段史料是在渥巴锡等人亲自讲述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段史料印证了外文史料中所述书库尔岱青赴藏熬茶确有其事,也证明了阿玉奇少年时代是在准噶尔部度过的。正因为这些渊源关系,在阿玉奇执政期间,虽然有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的阻挠,阿玉奇还是频繁派人到西藏礼佛熬茶,次数竟达八次之多。其后的执政者顶住俄罗斯要求土尔扈特部落皈依东正教的压力,仍于赴藏熬茶之事积极努力,派使到西藏熬茶。策凌敦多克执政后,所派熬茶使经清廷允许并派员护送下,于雍正九年(1731)到四川泰宁拜见在此暂住的七世达赖喇嘛,请封策凌敦多克以名号,如愿以偿。次年土尔扈特熬茶使抵藏熬茶,归途又在西宁停留熬茶。土尔扈特此次熬茶,是清代档案中可以查到的最早的过程较为详细的一次,顺治、康熙年间的土尔扈特赴藏熬茶,偶见有零星档案。

身处异域的土尔扈特的赴藏熬茶活动,会因种种因素而搁浅,乾隆四年(1739)九月初八日,就土尔扈特赴藏熬茶并派幼童10人前往学习经典之请,乾隆帝谕理藩院:“从前土尔扈特汗曾奏请往西藏煎茶行走,今土尔扈特虽为鄂罗斯(即俄罗斯——引者注)属下,犹然敬奉佛教,远道前来呈请恳令伊等往藏内煎茶等语,若竟不许其前往,不但有碍于中国与鄂罗斯定界以来和好之道,而其情亦属可悯。但土尔扈特系鄂罗斯所属,异国之人欲令十数幼童往藏内居住习经,且鄂罗斯之人其教本异,从前并未往藏内行走。此二节,则断不可行,若鄂罗斯哈屯汗止令土尔扈特遣人往藏煎茶,彼处之萨纳特衙门亦必有咨文呈请理藩院,则土尔扈特虽系鄂罗斯属下,朕因和好之故,亦必允其所请矣。现今鄂罗斯萨纳特衙门,虽给与土尔扈特使臣路引文凭,并未咨行理藩院,俟行文到日,另议具奏。”^①从中不难看出,土尔扈特赴藏熬茶,向已有之,但这次问题出在俄罗斯管辖下的土尔扈特请准10名幼童住在西藏习经,且其使团中有俄罗斯人,俄罗斯教本不同,清廷不可能允许俄罗斯人随团入藏。如果从当时的历史大环境分析,此时的清廷正在与西北的准噶尔蒙古谈判划界,噶尔丹策零以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圆寂需作佛事并为噶尔丹策零之父已故策妄阿喇布坦熬茶为由,奏请乾隆帝准许遣使人藏,乾隆帝已经答应了准噶尔蒙古可派300人进藏,并且为此筹办的事项极为繁多,单从精力、经济上考虑清廷也不可能让两支熬茶使团同时进藏,况且准噶尔蒙古与土尔扈特蒙古间原本存在矛盾,因此从安全上考虑,清廷也不想有节外生枝的事,故而土尔扈特赴藏熬茶的请求,其后俄罗斯萨纳特衙门虽曾咨文理藩院,仍被拒绝。

随着清廷统一天山南北,同样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提出的人藏熬茶请求,即获得了允准。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十一日,乾隆帝对军机大臣等讲:“据土尔扈特敦多布达什奏请差人赴藏一折,著寄麒麟保,查照从前谕旨,如止系土尔扈特遣人前来,一面奏闻,一面带领来京,沿途准与蒙古人等交

^① 《清高宗实录》卷100,第14页,乾隆四年九月壬子。

易。倘仍带俄罗斯同往,须谕以俄罗斯不应赴藏,即行停止,并谕令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遵照办理。”^①从乾隆帝这道谕旨来看,清廷除仍然坚持不准俄罗斯人随团入藏外,对土尔扈特熬茶使的政策则相当宽松,不仅准其进京,还允许沿途与蒙古人交易。当年九月,土尔扈特熬茶使吹扎布一行到达时,乾隆帝正在木兰秋狝,乾隆帝先在行幄召见吹扎布等,而后带至避暑山庄多次宴赏,其间吹扎布等请求入藏熬茶,乾隆帝派乾清门侍卫傅景护送到藏,不巧的是正在筹办熬茶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乾隆帝遂令吹扎布一行先往后藏,于次年返回前藏熬茶,至四月事毕离藏返回。

二、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的赴藏熬茶活动

正是有上述渊源关系,当乾隆帝听闻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即降谕旨:“观策伯克多尔济所派格隆纳木库巴勒珠尔,格隆乃喇嘛也,彼等尚异于俄罗斯。俄罗斯并不尊奉黄教,故不准厄鲁特等自由推行黄教。按我大国之例,凡来归各部人众,断不令改其原教,彼等若请赴西藏熬茶,亦不阻止其愿望。今西藏皆为我域,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均住于彼。若论黄教,再无比其更为尊贵者”。^②就是说,乾隆帝很清楚土尔扈特之所以来归,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教与俄罗斯不同,来归之后必然要提出赴藏熬茶,因此尽管土尔扈特来归之初各项安置和接济事宜极为繁杂,但还是在第一时间谕令筹办安排土尔扈特进藏熬茶之事宜。

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的赴藏熬茶活动,第一次成行是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这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向伊犁将军舒赫德表达了打算派喇嘛等赴藏拜谒达赖喇嘛的心愿,舒赫德立即上奏,获得乾隆帝允准,并确定了行进路线、经费支出、前往人数。土尔扈特熬茶人等先由各自之游牧地分别启行,于当年十月底到哈密汇合,然后一起进京,再在理藩院所派官员的陪同下由北京经陕西、四川进藏,返程则经宝鸡等地回到哈密,再由哈密分别返回各自之游牧地。其经费经舒赫德奏请官为办理,奉旨允准,故“由游牧至哈密自备资斧而行,由哈密去往京城时,官为办理,渥巴锡所遣之人,皆四人合给官车一辆,其所食口粮,按照回子伯克随从人员之例拨给遣往京城,交付理藩院核定办理遣往西藏。”^③此次土尔扈特各部起先派了35人,但沿途及于京城出痘亡故者9人、因病留于京城者一人,共有10人不能成行,只有“其余二十五人,连同已故雅兰丕勒、罗布桑扎勒散之沙弥格敦等六人在内,共三十一人,派理藩院章京一员、笔帖式一名,率领催二名伴送至藏。”^④理藩院笔帖式富克精额带此31人到藏后,在藏及返回途中又病故2人,因而实际返至哈密的只有29人,29人中24人为土尔扈特各部原派之人,其详细情况可见于哈密办事大臣明起所报之名单:“土尔扈特汗渥巴锡所派之人五名,扎木巴格隆、扎木巴赞布、罗布藏济木巴、章喀齐巴、萨木坦;贝子恭坦所派之人一名,沙喇毕格隆;公拜济瑚所派之人一名,劳藏吹喇克;台吉博罗哈什哈所派之人一名,巴勒珠尔格隆;亲王策伯克多尔济所派之人一名,阿拉西;台吉奇哩布所派之人一名,翠鲁克格隆;台吉阿克萨哈勒所派之人一名,昭齐格隆;贝勒默们图所派之人二名,西喇布格粗勒、噶绷;贝子奇布腾所派之人五名,沙喇布、策木布勒、莫罗木、曲鲁木、夏喇布;台吉舍楞德勒格所派之人四名,斋桑卓特巴、吹喇克、卓特巴、达布克依;贝勒恭格所派之人二名,噶绷依西、诺尔布扎木苏。”^⑤此次土尔扈特各部原派35人中,据明起所报名单,返至哈密的策伯克多尔济之属下有3人,即所列亲王策伯克多尔济所派之阿拉西和策伯克多尔济之

① 《清高宗实录》卷512,第20页,乾隆二十一年五月戊寅。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钦差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奏折。

③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哈密办事大臣明起奏折。

④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哈密办事大臣明起奏折。

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哈密办事大臣明起奏折。

弟奇哩布所派之翠鲁克格隆、阿克萨哈勒所派之昭齐格隆,而实际上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原曾派有五人,其中二人因出痘亡故。此次土尔扈特熬茶,所有行程历时一年有余,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月初五日抵达哈密后分别返回各自之游牧地。

此后的二十年间,土尔扈特蒙古便未再派人赴藏,直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伊犁将军保宁到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巴什游牧时,车凌乌巴什等当面恳请准许派人赴藏熬茶,此后又再多次呈请,故经保宁具奏允准其请,但次年派出的熬茶人等因廓尔喀入侵西藏而中途返回。不久西藏战事结束,乾隆帝即以“武功已竣,西藏业已永久无事,相应将此交付保宁等,彼等若情愿前去熬茶,此间选人,彼等何时前往,即随其便遣往。”^①乾隆五十八年(1793)初,“土尔扈特汗霍绍齐、亲王车凌乌巴什、郡王车凌德勒克、贝勒默们图,和硕特贝勒特恩特克等所派之人及堪布喇嘛等所遣喇嘛等”,^②在伊犁将军保宁所派满洲佐领奈尔图等照料下,于四月二十日前后由哈密起程,西宁办事大臣特克慎派通事往迎,于六月二十六日护送至西宁,随后在西宁采办行粮,并在附近寺庙熬茶月余,七月底由西宁办事大臣特克慎派通事、蒙古兵护送,于九月初通过青海西界多伦巴图尔,十月抵达西藏,拜谒八世达赖喇嘛、七世班禅额尔德尼进献礼物,在各寺庙熬茶布施。在藏五个月之后,熬茶人等由驻藏大臣拨给骑驮之牲畜及盘费,并派兵偕同奈尔图及其所带满洲兵四名护送,于三月二十二日由藏启程前往多伦巴图尔。西宁办事大臣接到驻藏大臣咨文告知,即“派通事等迎至多伦巴图尔一同照料,于七月十九日抵达西宁,地方官员等拨给奈尔图等以盘费、牲畜”^③后,七月二十九日仍由西宁办事大臣派主事二名、蒙古兵二十名护送,于八月二十一日出青海地界,经哈密返回各自之游牧。随后土尔扈特汗霍绍齐、亲王车凌乌巴什等共同呈文伊犁将军保宁称:“我等所遣人员抵藏,为祈祷大圣皇帝之座万万永长,叩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布施,于大昭各寺皆念经。我等之人均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摩顶。熬茶之事善终,现皆安抵游牧,且又得以由藏请至佛尊者,皆系大圣皇帝之恩也。嗣后我等所有人众皆更愿逸乐安生,感激大圣皇帝之恩。”^④此后,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巴什专程派人至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伍弥乌逊处,请求进献由藏请至之奔巴瓶,呈文称:“去年由我等游牧派往西藏之官员、喇嘛等,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处,为大圣皇帝万年奠安念经修成阿济苏,供于银奔巴,又请至甘珠尔经佛龛,现皆安然返回游牧。嗣后于车凌乌巴什、阿咱拉、恭格车凌等游牧均为大圣皇帝之万寿永福甘珠尔经祈祷外,责往由藏请至阿济苏奔巴一只敬谨进献,请参赞大臣处代为转呈大圣皇帝。”^⑤伍弥乌逊见亲王车凌乌巴什真诚感激,遂答应代为进呈,乾隆帝收到奔巴瓶,赏亲王车凌乌巴什“哈达一方、俐玛佛一尊、缎二匹”。^⑥

第三次赴藏熬茶则是在十余年之后,嘉庆十年(1805),土尔扈特汗霍绍齐请求次年派人赴藏熬茶,亲王车凌乌巴什面见将军松筠询问相关事宜,并请亲自带人前往。九月初二日,伊犁将军松筠奏称:“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土尔扈特等赴藏熬茶以来,现已有十年。是故,适才土尔扈特汗霍绍齐报请明年派遣五十人,且今亲王车凌乌巴什报请明年派遣四十人。其余土尔扈特王、贝勒亦派人熬茶,相应俟彼等报齐后,奴才再照例代为请旨具奏,遣往办理,”^⑦到年底时,各地拟派人数为:“哈喇沙尔、塔尔巴哈台、库尔喀喇乌苏三处土尔扈特、和硕特汗、王、公、扎萨克台吉等共派熬茶僧俗一百四十八

①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伊犁将军保宁奏折。

②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八日西宁办事大臣特克慎奏折。

③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三十日西宁办事大臣特克慎奏折。

④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伊犁将军保宁奏折。

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伍弥乌逊奏折。

⑥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六十年闰二月二十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伍弥乌逊奏折。

⑦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年九月初二日伊犁将军松筠奏折。

人,加之伊犁堪布喇嘛、厄鲁特等派二十六人,”^①准备来年开春启行。亲王车凌乌巴什听到准许其亲自赴藏熬茶的消息,立即赶到伊犁面见伊犁将军松筠谢恩,并提出要带其妻一同前往,但这一要求以“赴藏道路迢远,路途间或有瘴气,不宜妇人行走。尔率尔之次子前往,即带往二十五人,若哈屯前往,带往之人更多,盘费等皆靡费。管束游牧人众者亦重要,哈屯不去,则两相皆有益”等由被伊犁将军松筠拒绝,车凌乌巴什表示悦服,未再坚持。嘉庆十一年(1806)四月,“车凌乌巴什及塔尔巴哈台、哈喇沙尔、库尔喀喇乌苏等游牧、伊犁厄鲁特营、堪布等所派僧俗共一百七十八人,”^②在伊犁将军松筠选派之锡伯总管图伯特照料下自哈密启程,于十月初十日抵达西藏。驻藏大臣玉宁等“交付济咙呼图克图、噶伦等,整备房屋供其住宿,照例由达赖喇嘛商上拨给口食米、盘费”。^③在藏熬茶期间,亲王车凌乌巴什呈请由藏延请喇嘛一名携往其游牧念经,经驻藏大臣玉宁转奏,奉乾隆帝谕旨:“土尔扈特如同杜尔伯特等尊崇黄教,著施恩饬交玉宁等,由在藏精通经咒堪布喇嘛内挑选一名,准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巴什延往,于其游牧修善事。”^④因此次年亲王车凌乌巴什等由藏启程时,驻藏大臣玉宁等令所选堪布扎木巴克依鲁布随往,并“另行办理路票颁给堪布扎木巴克依鲁布及随行喇嘛共十五人,各游牧土尔扈特等及伊犁堪布所派厄鲁特等,均交原率领而来之总管图伯特照料,”^⑤于三月初七日由藏启程。熬茶期间,“土尔扈特等给达赖喇嘛商上进献金四两三钱、银七万一千九百二十八两,给班禅额尔德尼进献金一百二十一两、银三万二千五十三两,于前后藏共进献金一百二十五两三钱、银十万三千九百八十一两。”^⑥此次熬茶,亲王车凌乌巴什往返一年有余,返回之后,又专程到伊犁见伊犁将军松筠表示感谢,并请来年到热河避暑山庄朝觐。

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最后一次即第四次赴藏熬茶是在嘉庆末年。嘉庆二十四年(1819),经伊犁将军晋昌奏准,土尔扈特汗策登多尔济之母哈屯喇什皮勒、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公阿咱拉等人准备次年进藏熬茶,但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启程前,土尔扈特汗策登多尔济之母哈屯喇什皮勒因腿腿肿痛、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公阿咱拉因旧病复发而未能成行,熬茶一行遂由“土尔扈特亲王恩克济尔噶勒之母哈屯达巴及塔尔巴哈台、哈喇沙尔、库尔喀喇乌苏、精河地方游牧土尔扈特、和硕特,伊犁、塔尔巴哈台察哈尔、厄鲁特部所派僧俗人等”^⑦组成,“由伊犁将军处所派佐领岳克庆阿、骁骑校德奔泰护送,于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抵藏。其中除自西宁来藏途中病故之土尔扈特、厄鲁特等部八人外,现有二百八十三人抵藏。”^⑧土尔扈特亲王恩克济尔噶勒之母哈屯达巴及土尔扈特、和硕特各部所派之人,外加伊犁、塔尔巴哈台察哈尔、厄鲁特所派僧俗人等,在藏逗留将近五个月,期间前往前后藏各寺庙熬茶布施,最后留下36人在藏习经,其余247人,于道光元年(1821)四月二十日,仍由原护送佐领岳克庆阿、骁骑校德奔泰率带由藏启程。此次熬茶,共于前后藏各寺庙布施“金四十二两、银七万三千零八十两”。^⑨哈屯达巴返回霍博克赛里后,派其子亲王恩克济尔到塔尔巴哈台城见参赞大臣百顺,请求称:“去年恩克济尔噶勒我之母达巴赴藏,于班禅额尔德尼处为大圣皇帝之万年康安念经修成阿济苏,供奉于银奔巴,又请至甘珠尔经佛龛,现皆已安然返回游牧。嗣后,于恩克济尔噶勒我等游牧均为大圣皇帝之万寿,永啐甘珠尔经祈祷外,敬献由藏请至阿济苏奔巴一只,故此贡至,请参赞大臣代

①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伊犁将军松筠奏折。

②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驻藏大臣玉宁奏折。

③ 同上。

④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二十日伊犁将军长龄奏折。

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二年三月十五日驻藏大臣玉宁奏折。

⑥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二年三月十五日驻藏大臣玉宁奏折。

⑦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伊犁将军庆祥奏折。

⑧ 同上。

⑨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元年四月二十一日驻藏大臣文干奏折。

为进献大圣皇帝。”^①百顺遂按乾隆五十九年(1794)亲王车凌乌巴什进献由藏请至之奔巴瓶之例,代为由驿递送京城。道光帝收到奔巴瓶,回赏哈达、佛尊、缎匹。

三、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曾经搁浅的赴藏熬茶活动

回归后的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的赴藏熬茶活动,也有几次因种种原因而搁浅或中途折回。军机处满文档案反映,乾隆五十年(1785),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呈文称:“先前派人赴藏时,我等游牧人众贫困,未能进献物品、多派人前往。今蒙大圣皇帝恩福,各项牲畜孳生繁多,我等游牧有近二百人情愿自备资斧赴藏,进献伯勒克于达赖喇嘛叩谒,为己故策伯克多尔济、奇哩布等念经、众人祈福。趁此之便,带往幼童数名习经,俟过数年,仍行接回游牧外,仍求达赖喇嘛,带回在藏之良医。若蒙准行,则此间牧养骑驮之马驼至膘壮,申年再报明请颁路票前往。”^②对于呈文中提出的派人赴藏熬茶祈福、带去幼童学习经咒、由藏带回医生三点请求,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以所派熬茶人数过多,塔尔巴哈台有现成达喇嘛,可派幼童去学习,霍博克赛里附近其他游牧有医生,需要就医可以去请为由加以拒绝,乾隆帝也赞同惠龄的作法,于当年七月初三日专降上谕:“惠龄等如此办理者尚是,即便内外扎萨克等有派人赴藏熬茶之事,亦不逾一百人遣往而已,并无遣往二百余人之例,且土尔扈特等来归已有多时,已与朕之旧部毫无区别,理应知此。即便延请医生、令幼童习经之事,伊犁等地有现成良医及达喇嘛,尽可就近延请医生、教幼童习经,尚可免去繁琐多人远行。此等之事,历经将军伊勒图驳回,彼等理应遵照将军所定条例而行。著惠龄等将此复行明白开示阿克萨哈勒。彼等既称申年方行赴藏,相应事尚早,此间惠龄等唯遵旨留心办理。”^③此处所说“申年”应指“戊申”年,即乾隆五十三年(1788)。此后不久,阿克萨哈勒到塔尔巴哈台见惠龄,经惠龄当面晓以谕旨,阿克萨哈勒请求准派39人前去熬茶,其他两点则遵例而行。派39人入藏熬茶之事,此后未再见提及,估计期间阿克萨哈勒病重,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永保前去霍博克赛里视察时,“观阿克萨哈勒之情形,人极明白,唯说话时舌软无力,偶或言语不清,虽似粘痰之症,然于脚无妨,仍能活动。其游牧除阿克萨哈勒外,仅有车凌乌巴什、恭格车凌两名扎萨克,皆年轻未曾经历事,办理游牧事务,倘阿克萨哈勒在前指导办理,明白事之轻重,且其人众亦皆心服。车凌乌巴什即其亲生之子,亦无不听其言之处,今其病情,并非完全迷糊不明事,相应尚暂不必易人,仍令办理扎萨克之事务,似于事有益。故奴才将此情晓谕于阿克萨克勒,据阿克萨哈勒言称,我亦虑此等情由,唯我现患有病,仍一味承领皇上所赏俸禄留恋盟长印,委实于心不安,极为惶恐,始方如此冒然考虑,今参赞大臣既如此交付,相应我但尽心竭力勤勉。”^④也许因为盟长阿克萨哈勒患病,亲王车凌乌巴什年幼,“申年”熬茶之事就未再提及。

乾隆五十七年(1792),土尔扈特汗策林纳木扎勒、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巴什等请求派人赴藏熬茶,经伊犁将军保宁具奏获准。土尔扈特所派熬茶人等自三月十五日开始从各自之游牧地启行前往哈密,于四月十四日由哈密启程东行,但土尔扈特人众在前往哈密的途中,乾隆帝已经有道谕旨:“保宁奏土尔扈特汗策林纳木扎勒等派人赴藏熬茶一事,蒙古汗、王等派人前去叩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熬茶者,系尊崇黄教之蒙古等旧例,虽属可行,然今正值藏地征剿灭廓尔喀贼用兵之际。彼等赴藏,沿途需有官兵照料,且抵藏后亦需关照彼等。彼等请求派人之初,保宁理应暂加制止,俟大功告竣,再行遣往。保宁缘何未虑及此耶。现藏地正在用兵之处,保宁岂有不知乎。著寄信教训保宁,仍

①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百顺奏折。

②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年六月初七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奏折。

③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年八月初六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奏折。

④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永保奏折。

寄信奎舒,将截留彼等明白晓谕,俟功成再准赴藏,”^①哈密办事大臣接奉此道谕旨时,土尔扈特熬茶人等业已行至哈密所属岗大营子地方,经陕甘总督勒保札飭靖逆营游击派员转谕,于十八日返回哈密,之后陆续返回各自之游牧,亲王车凌乌巴什所派赴藏熬茶人等于六月抵达其霍博克赛里。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二月,因哈喇沙尔、塔尔巴哈台、库尔喀喇乌苏等处办事大臣咨称各自所辖之护理土尔扈特盟长印福晋喇什皮勒呈请明年率领其孙汗那木扎勒珠尔默特策林及其妻德勒克济特赴藏熬茶;亲王恩克济尔噶勒、郡王那木扎勒车登、精河土尔扈特贝勒巴图纳逊之妻德木伯乐勒等皆请亲往,以及公、贝勒、扎萨克、台吉等亦派属下人等随同喇什皮勒前去熬茶,伊犁将军布彦图遂就此事奏称:“将其随行人员、各游牧派往熬茶及学习经咒之喇嘛数目,由奴才处概行酌减,连同伊犁察哈尔、厄鲁特营僧俗在内,共为二百余人,俟明春返青令其起程时,仍照先前办理之例派委明事通晓蒙语之员二人照料起程,先行咨行各该地方大臣等,令彼等于明年四月内均抵达哈密,交付伊犁所派诸员护送。谨将此预先具奏,命下之日,奴才照例咨文路经各处大臣、驻藏大臣等。”^②此事虽经奉旨允准,但次年临近启程,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端多布咨文伊犁将军布彦泰称:“霍博克赛里游牧土尔扈特亲王恩克济尔噶勒双腿虽皆肿痛,不便骑马,然尚堪办事,惟不能赴藏,亦不派遣随从人员。”^③布彦泰认为“土尔扈特亲王恩克济尔噶勒请于本年赴藏熬茶者,亦系其虔笃之诚意。今其双腿肿痛不能骑马者实,相应奴才等照依其呈文,免土尔扈特亲王恩克济尔噶勒赴藏,在游牧治病调养,将拉特那巴咱尔署理盟长印、扎萨克印仍移交恩克济尔噶勒办事,其随往人员亦加制止。”^④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此次赴藏熬茶因此而搁浅。

四、清廷关于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活动的相关规定

纵观清代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的赴藏熬茶活动,无论成行或搁浅,每次都是与其他土尔扈特各部共同进行的,未曾独立进行,因此所有关于赴藏熬茶活动的规定都是针对土尔扈特各部而言的。

关于费用。回归后的土尔扈特蒙古第一次赴藏熬茶,是在其回归不久,因此清廷考虑其部众财力有限,除由各个游牧地到哈密是自费外,从哈密到京城,再从京城到西藏的费用均由官出,即按“先前护送厄鲁特、回子等之例,四人合给车一辆、每天每人各给行粮一斤。”^⑤这应算是一次特例,因为乾隆帝当时有旨:“派人赴藏熬茶、叩谒达赖喇嘛者,均系为其私事。是故,凡有蒙古等派人赴藏,无需官为办理,均经具报自备资斧前往。唯渥巴锡等人,乃甫来归附之人,在在均未服习,且称此为初次派人赴藏,相应著即照舒赫德等所奏,官为办理遣往,嗣后不准照此办理。倘官为办理遣往,彼等不知足,必致每年派人遣往,则即非事也。”^⑥正因为如此,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提出来年派人赴藏熬茶时,请求借支两年的俸银,并分作两年扣完。乾隆帝因此降旨:“策凌纳木扎勒等于明年自备资斧差人赴藏熬茶,即照保宁所请借支俸银二年,但所借之俸若作二年扣完,于伊等生计未免稍形拮据,著施恩作为四年减半坐扣完结。”^⑦此后借两年俸银分四年扣完遂成惯例,未曾改变。

关于期限。回归后的土尔扈特于乾隆三十七年(1773)底第一次派人赴藏熬茶,由于先去京城再去西藏,程途遥远,因此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5)春方返抵哈密,前后跨了三年。此后都是路经青海

①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和珅致伊犁将军保宁寄信上谕。

②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伊犁将军布彦泰奏折。

③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伊犁将军布彦泰奏折。

④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伊犁将军布彦泰奏折。

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哈密办事大臣明起奏折。

⑥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奏折。

⑦ 《清高宗实录》卷1391,第8页,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庚寅。

直接去西藏,因此一般都第一年春离开游牧地,于次年返回游牧地,未再见有跨三年的。至于每次赴藏熬茶的相隔时间,开始并无规定,根据土尔扈特的请求予以办理。乾隆五十七年(1792)令土尔扈特熬茶人等中途返回时,乾隆帝谕令伊犁将军保宁制定章程,准十年或逾十年派一次。接而保宁奏称:“查得,土尔扈特、和硕特等自三十七年派人赴藏熬茶,已有二十余年,故今始行派人。虽未派人照管,唯土尔扈特等性极尊崇黄教,且此数年仰承圣主豢养之恩已极宽裕,其游牧之力迥异于前,故此次携往之布施银即有十万两余,嗣后诚难不派人赴藏熬茶。倘不定一章程,任其前往,亦有未便,相应奴才拟定,嗣后土尔扈特等若呈请派人赴藏熬茶,已逾十年,则准遣往;若在十年内,则驳回不准;”^①奉旨照准。此后的土尔扈特入藏熬茶,其相隔时间均在十年以上。

关于人数。入藏熬茶,作为土尔扈特回归后一个常态化的活动,入藏人数开始时并无定数,后来才有基本的规定。第一次赴藏熬茶派了35人,后来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请求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派人赴藏时,以第一次去时财力所限未能多派人去为遗憾,要求派往200人,被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驳回。乾隆帝很是赞赏惠龄的做法,降旨:“惠龄等如此办理者尚是,即便内外扎萨克等有派人赴藏熬茶之事,亦不逾一百人遣往而已,并无遣往二百余人之例,且土尔扈特等来归已有多时,已与朕之旧部毫无区别,理应知此。”^②阿克萨哈勒闻听这道谕旨,将人数减至39人。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虽曾规定:“其遣往人数,各游牧统共不得超过百人;其留藏习经者,由台吉之子弟、众喇嘛内,挑其聪慧英俊者,不得超过二十人遣往。”^③但观其后所派人数,除乾隆五十八年(1793)人数不详外,嘉庆十一年(1806)为178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291人,均超过了此数,可见有关人数的限定并不是绝对的。

关于路线。土尔扈特熬茶者的入藏路线,只有第一次是特殊,即在哈密集齐后先到京城,再由京城进藏,其余都是被派往熬茶的人根据路途的远近先由各自的游牧地出发,统一在哈密集合,然后从哈密启程入青海界,再由青海入藏,返回亦如之。

关于护送。遇有土尔扈特派人人藏熬茶,管理土尔扈特各个游牧的清朝官员都会派官兵护送至哈密,伊犁将军则派官兵到哈密接管,由此全程护送,进入青海界,西宁办事大臣派官兵护送至西藏界,再由驻藏办事大臣所派官兵迎送,甚至第一次赴藏熬茶时由于到京城后再进藏,还曾由理藩院增派主事、笔帖式、领催等伴送到藏,程途提供有绝对的安全。

结 语

总之,对笃信藏传佛教的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而言,赴藏熬茶,是其宗教信仰使然,也是其宗教活动的一种重要仪式,从其首领到部众都十分重视,企望能够实现,以满足精神层面的一定需求。清廷十分了解和尊重他们的信仰和愿望,每当他们提出赴藏熬茶的要求后,若无特殊情况都要仔细筹划,精心安排,故而土尔扈特蒙古在回归后得以四次顺利进藏,实现了拜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愿望,获得了精神的慰藉。另外,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讲,清廷也十分重视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一事,逐渐建立了比较规范和系统的制度,从而保证了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活动的长期有效地进行。同时,从统治的角度来讲,清廷高度重视和精心安排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活动,无疑受到土尔扈特蒙古部众及西藏宗教人士的认同和信服,从而有助于妥善处理民族和宗教关系。

[责任编辑:奥其]

①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十八日伊犁将军保宁奏折。

②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年八月初六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奏折。

③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十八日伊犁将军保宁奏折。

information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On Hobuksar Tuerhute's tea donation to Tibet in Qing dynasty Guo Meilan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Oirad Mongolian nomadic in northwest reg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tribes: Junggar, Tuerhute, Dorbet, Heshuote. Because the tribes competed for the grassland, Tuerhute selected westward migration and settled in the volga river valley.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uerhute Mongolian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a series of war under Wobaxi's leadership in Qianlong 51 years. The Qing government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and attended Tuerhute, and gave pension support to the people of back home through hardships, and specified the land for resettlement. Then Qing government arranged Tuerhute leader to tribute in Summer resort, and settled tea donation to Tibet. About Tuerhute's tea donation to Tibet, after Tuerhute return Qing government made arrangements for the first time. Just because the past master data is not much and the emphasis of the research are different, Tuerhute's tea donation to Tibet has been neglected until now. It led to the blank in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On the Manchu Edict that Kangxi gave Tuerhute Ayuqi khan Altanochir

In Kangxi 51 years, the Tulichen mission of Qing dynasty was sent on a mission to the kalmyk Mongol khanate according to imperial edict. In June Kangxi fifty-three years, the mission arrived in Manutuohai of the volga river basin, and issued imperial edict to Ayuqi khan. This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kalmyk Mongol khanate, even Qing dynasty and Russian relation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Manchu Edict's related history and characters, and had a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Manchu Edict's Latin transliteration, Latin transliteration, annotations, re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the author adopted philology's research methods, and had textual research combining historical facts.

On Xin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s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from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e Gereletu

This paper analyzed Xin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s policy of national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Hejing county Xiemierqubademu village's villager Niman's petition to the government about improvement of the Mongolian women's clothing in 1941 in "the Archives of Modern Xinjiang Mongolian History".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he Biographies of Cebo Dao Er—ji Nuoyan" Kanaru, Cairendaoerji

The materials of Todo Mongolian "the the Biographies of Cebo Dao Er—ji Nuoyan" has some literature reflecting Cebo Dao Er—ji Nuoyan's stories. After it was found, the author preliminary explored the 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features and characters. The author also determined the book's literature value. This book provides the researchers with first-hand information text.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Black Lama Du Shanshan

Abstract: At the end of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Black Lama, Dambijantsan was such an active man i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 but disappeared after 1923. His story was recorded by numerous west China adventurers, which initiates many other researches on him.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se records in 1890s—1930s and reviews those researches on Dambijantsan.

On the Mongolian Place's Structures and Semantic Meanings Jia Xiru

Qinghai is a multi-ethnic populated place, ethnic culture collision, blend in here, formed the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You win to have me, I win to have you". Mongolian Place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From Mongolian Places' naming and its history, culture significance, We not only can explore its language features, and more can explore its history and national psychological traits.